

从赤脚医生 到美国大夫



● 刘钟毅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从赤脚医生到美国大夫

一个美国医学专家的半生自述

医学博士 刘钟毅著 任政题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徐 跃
封面装帧	范一辛
美术编辑	王建纲

从赤脚医生到美国大夫

——一个美国医学专家的半生自述

〔美〕刘钟毅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平本 850×1156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57,000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208-01856-1/K·410

定价 9.60 元

序

巍巍乎刘钟毅君，皎皎如月之华、昭昭如日之晴；傲霜若东篱之菊、挺拔似山巅之松；气宇轩昂、躯胆俊伟；胸怀沧海、气贯长虹；凜凜君似雪、滢滢泉似君。今读其文，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亦如临其境，或流畅坦荡、似王右军之袒腹东床；或哀婉动人，若卓文君之白头吟咏；激昂处，惊涛拍岸、虎啸山林；气静时，春光普照、蜂蝶竞舞；文章迭荡起伏、浩气磅礴纵横；空谷幽兰、芳香四溢、沁人肺腑、余味无穷。

今祖国正值开放改革大潮，晴空万里、遍地皆春。刘君呕心沥血之作乃趁风而发、应时而生，可谓天相吉人、不亦快乎。

余年近八旬，与刘君缘属师生之谊，40年代先后执教、负笈于三湘雅礼校园。80年代，刘君东渡深造，执师礼恭似当年，勤托鱼雁于大洋两岸；终于以本文大作之稿见示。读之再三，不忍释手。对其顽强学习之超伟毅力，震撼不已。如谓天地、鬼神为之动容，亦不为过。不才执教鞭终生，焉敢称桃李满天下；然素以摆渡众莘莘学子，助其成才为乐。有缘来会者，何止万千；习医者，数以百计。70年代国门开放以还，出国者众，业医者不计其数。达异邦后，挟国内所造就之专业并外文实力，同年一举通过官定执照考者，未之闻也。而后刘君更再攀高峰，勇夺美国医学专家称号，为华夏增辉。何以致之？兹阅其回忆录，娓娓侃述其转化之艰难历程，始知其非偶然也。非常之人，必能忍大辱、吃大苦、耐大劳、而后

能处非常之事、越非常之境、成非常之才。刘君乃非常之人，殆无疑义也。谨书数语，以为后人楷，且以自励。

长沙老人 王颖珠 书于长安古都

1993年12月10日

前 言

在中国大陆湘西农村持续下放,作了10年的“赤脚医生”后,我在1978年3月回到城市的医学院工作,恢复教职。两年以后,受到洛杉矶尔湾加州大学医学院精神科的邀请,1980年4月25日,到达洛杉矶,在其教学医院精神科进修。同年8月17日,决定投考美国联邦医疗执照考试,而停止进修,以便全力备考。经过3个来月的准备,在1980年12月3日参加了那场考试,次年2月14日,得到通知一举通过。1981年8月1日,在洛杉矶加大教学医院开始四年的住院医生临床进修,1985年7月毕业。执业几年后,按照规定,通过考核,获得美国精神神经科专家委员会发给的专家文凭,成为美国精神神经科有证专家。随后深入美国社会,开始作精神科各种各样的临床工作,接触到这个文化结构迥然不同的社会中,各类人物心灵中的创伤和痛楚。

几年以来,每当我与中外友人谈起上述一系列不寻常的经历时,人们不能不马上产生两个问题。一、我真是一个赤脚医生吗?怎么到美国来的?任何医生都很难一到美国就通过那公认难度极高的医疗执照考试,何况一个赤脚医生。二、一个来自文化架构完全不同的中国医生,在美国接触到人们心灵中的创伤和痛楚时,有什么观感和体会?1985年,我开始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企图回答上面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可是,由于那时的写作条件是原始的手写笔耕,不可能适应作为医生繁忙的日程;经过一段时间的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后,我只好把它搁置起来。

1987年，我全力投入医生独自开展的业务中。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胜利，我在工作中引进和钻研应用电脑的新技术。由于生活在以白人为主的社区中，我的电脑工作只限于英文的文书处理和为提高工作效率的各种资料处理。1988年，在家中与孩子打乒乓球时，由于动作过猛，造成腰肌扭伤，不得不卧床两周。我得到一个难得的机会，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在床上钻研中文电脑。我发现，用中文电脑书写的速度，取决于中文字码设计的合理性。这正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速度快不起来。所以，我迟迟没有上马。后来我自己动手编制了一套全新的字码，用于输入中文，才算获得了一件锐利的武器，使写作的速度大大提高，比采用市面上所提供的字码所能达到的要快很多，为完成上述未竟的中文写作计划铺平了道路。（我所撰《刘氏码——电脑中文输入快捷的道路》一书介绍这套字码，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贡献给大陆读者）从此以后，可以做到专业的医生工作和作为业余爱好的写作两不误。

经过两年来在电脑前出神入化的回忆和舞盘扣键的运动，终于完成了这一部回忆录性质的散文集。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时哑然失笑，有时拍案称奇，而更多的却是泪水盈眶，为过去辛酸的遭遇作痛定思痛的悼念。我向读者保证，不管文中有多么荒谬的故事或怪巧的奇遇，它始终是一本句句真实的亲历实录。希望它能够回答上面两个问题。

可以看到，在来美国之前，我并没有为到美国来进修或考医疗执照而接受特别的教育或准备，相反，自从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以后，一再流放到农村底层，成了一个赤脚医生，前后达13年之久。离开农村两年后，阴差阳错，赤手空拳来到美国，一举通过联邦医疗执照考试，成为美国大夫。这一翻天覆地的变革，必然事出有因，不可能是偶然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请读者自己从阅读中评断吧。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刚来美国之初,也经历了一场正面的文化休克,为美国的成就所倾倒。可是,读者也一定会看到,我随后又经历了一波又一波负面的、第二度文化休克,深深为美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而震动。这是我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深入美国社会执业、考察美国的精神卫生而看到的。美国无疑是世界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从这个角度看,她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很可能就是别的国家明天也要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正视它,研究它,从而学习她正面的经验并吸取反面的教训。这样作时,我主要是从中国文化的观点和美国精神科的某些现象出发,这是我把这本回忆录付印的另一个原因,我所看到的问题,多为感性的,深度有限,如果有失片面甚至讹误,尚希海内外专家不吝指正。

美国精神神经科有证专家
Diplomate, American Board of Psychiatry
& Neurology

医学博士 刘钟毅于洛杉矶

1993年6月30日

目 录

序	王颖珠
---------	-----

前 言	1
-----------	---

下放篇

第一章 相拥窑洞、泪水双流：我是怎样 成为赤脚医生	3
第二章 锻炼：农村生活基调	13
第三章 巴山楚水、桃李芬芳：在农村教授医学百科	23

寒窗篇

第四章 十年寒窗无人问：学习英文的漫长历程	37
第五章 零存整取：自学俄文获得巨额稿费	47
第六章 更上一层楼：在农村学习日文、德文和法文	58

异乡篇

第七章 难报的知遇之恩：傅世春、姜焕明教授 资助我出国学习	73
第八章 第一波文化休克：初渡太平洋	81
第九章 喜极而泣：一举通过美国联邦医疗 执照考试	89
第十章 披肝沥胆、伯乐解困：我的第一个美国上司	99

第十一章	充满着文化观念的冲突：四年住院医师 期间的经历·····	107
第十二章	竞争、竞争：精神科执业小记·····	126

感怀篇

第十三章	意识领域外的心理活动不容否定：中国 精神病学的缺陷·····	141
第十四章	精神病患者的权利和社会安全：美国 精神卫生立法的弊端·····	156
第十五章	东西方文化架构中性观念的区别：文化 观念冲突的一个实例·····	169
第十六章	现代社会三A综合症：美国社会危机解析·····	178

尾声

第十七章	憧憬，我的婚礼·····	193
------	--------------	-----

下 放 篇

11 12 13

第一章 相拥窑洞、泪水双流：我 是怎样成为赤脚医生

在中国大陆，赤脚医生是指农村基层土生土长的卫生人员。他们只受过短暂的初步训练，平时与当地的农民一样，打着赤脚从事农活，在农民有什么三病两痛时，就找他们看病；他们尽其所能，就地处理和治疗。如果解决不了问题，他们或者请基层诊所的人员下来看病，或者帮助把病人送到上一级医疗单位处理。他们很受农民的欢迎，所以被亲切地叫作赤脚医生。

我本来不是赤脚医生，而是1944年美国雅礼会创办的湘雅医学院（1953年改名为湖南医学院）1954年毕业的正式医生，并且是在医学院从事教学和医疗的专科医生。我也没有到农村从事过农活。可是，自从1958年以后，由于我在政治上被认为“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又没有达到正式触犯法纪的地步，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作为一种惩罚，把我从医学院下放到农村从事农活，兼作基层的卫生工作。从1954年4月医学院毕业，到1980年4月离开大陆，我在中国大陆26年的医生生涯中，有13年是在农村度过的，所以我有充分的理由称自己为赤脚医生。

那么，我到底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呢？其实，我不过是在1957年的“帮助”执政党的“整风运动”中，在当时各种各样、成千上万张大字报中出了一张不过三、四十个字的大字报，对1955年的“肃反运动”有所批评，不幸被打成“右派分子”，在1964年前后的“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中,对1960年前后大饥馑期间当局的错误作法有一些批评而被打成待处理的“反革命分子”。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

1

在1958年以前,我本来不是什么调皮古怪的角色。相反,我一直是受到群众和领导喜爱的人物。在医学院念书期间,从1949年成立班委会,到1953年进入医院实习,我一直被选为班委会的文体体育股长和课代表,在医学院、医院和护校三单位组成的“湘雅剧团”当副团长兼剧务主任,并光荣地入了团,担任医院团总支委员兼医院工会的军事体育委员。医院副院长本人和医学院副院长的夫人还曾分别出面给我介绍过女朋友。1956年我考取新政权成立后第一届正式的三年制副博士研究生。这些无疑都表明,我一直是积极上进、非常活跃、人缘很好的。不料,1957年“反右”风暴乍起,从此一切都变了样。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时,我在湖南医学院作神经科研究生。由于对业务学习抓得比较紧,我对于政治活动,只有最低限度的参与,所以并没有参加什么鸣放。不过,毕竟有一次,我情不自禁地写了一张大字报。那是我在整个鸣放阶段中所写的唯一的大字报。6月初的一天,我在医学院操场,听一位老师发言。他讲的内容,是描述他在早两年的肃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期间,他的太太正好怀孕,如何受到苛刻的待遇。我听了以后,写了一张大字报,贴了出去。同时,针对那位老师演讲的大字报也大量出现,很多人和我的大字报一样,批评当局在肃反运动中的偏激作法。为了应付这种局面,第二天,医学院当局动员了另一位老师出面,针对前者作了一些辩解。但是,敌对的情绪并没有得到化解,大字报更多。我发现敌对情绪如此激烈,运动前景难以预料,不想卷入政治斗争,就把我那张大字报撕掉了。果然,这一撕,使我从墓穴里

逃了出来。当时形势之险恶，可以这样形容：

万霆千钧一发间，大仔丧家，
铺天盖地百密疏，鱼儿漏网。

后来，过了几天，运动改向，由鸣放转入反击的阶段，对在鸣放阶段许许多多对当局持批评态度的大字报作者，展开了无情的围剿。鸣放阶段不合拍的一言一行，都已由当局记录在卷，存档待查。贴出仅一天后被我自动撕去的那张大字报也不例外。

第一波“反右派”运动过去后，开始对所谓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清理。我受到重点批判。围绕那张大字报，无限上纲，在神经科，在研究生班，在共青团内，对我深挖思想根源，深挖社会根源，挖得不亦乐乎。平时的一些小缺点、过失，都成了我写那张大字报的根源，我一无是处。不过，我毕竟没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算是幸运的。

到了1958年，医学院党委书记从北京学习归来。他提出，湖南医学院作为旧精英美帝文化侵略在旧中国的大本营，必然是资产阶级右派的老巢。他认为，湖南医学院的右派份子抓得不够，有必要补课。因此决定开展第二波的“反右派”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对我重新批判的风声一步步逼近。我预料的一刻终于来到：一天上午，团支部书记突然来到我工作的场所，通知我当天下午召开全院团员大会，由我检查问题。我只好硬着头皮，按时前往会场。等我刚刚来到会场，一个尖声女高音立即嘶叫起来：“把隐藏在团内的右派份子刘钟毅揪出来批倒斗臭”。群众立刻冲着我挥拳高呼：“打倒死不悔改的右派分子刘钟毅”。以后就是那一老套当时早已耳闻目睹千百遍、对右派份子进行批判斗争的模式。会上不断有人引用我所写的大字报，来证明我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对党的“猖狂进攻”。当然没有人提到我自己第二天把大字报撕掉

的事。总之，经过一个多小时行礼如仪后，我被斗争会主持人宣布为右派分子，受到开除团籍的处分。

2

第二波“反右派”运动过去后，我和很多运动中被批判的对象一起，被命令参加医学院学生的队伍，下放农村搞卫生工作。我所在的队有20几个学生，除我以外，还有3个医生。就在下放出发前不久，我在公共布告板上看到一张医院团委会的布告，正式宣布开除我的团籍。令我感到意外和困惑的是，公告中没有提到我那顶业已行礼如仪、隆重加冕过的右派分子帽子。我到底是不是右派分子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来到农村。说我是吧，从来没有任何场合下，像对待别的右派分子那样，正式称呼我为“右派分子刘钟毅”。说我不是吧，队长和党团员对我总是一副卖牛肉的面孔。有时候，他们有讲有笑，嘻嘻哈哈，一看见我来了，就都板起脸来。队长既未称呼我为右派份子，可也未像对待另外那几位医生那样，称呼我为刘医生，而是直呼我的名字刘某某。我就这样混混沌沌、空虚糊涂地过着日子。

事有凑巧，我在队上与一位女同学发生了一段特别的交往，使我的空虚得到暂时的填补。这里面并没有一般意义的爱情，却让我有一段美好而辛酸的回忆。正应了我那本家、唐朝诗人刘禹锡所写的：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我们暂且把这位女同学就称呼为“晴”罢。晴的父亲为中学教师。她有一个小学加中学一共十二年园班的男同学，在外地一所

高校念书。他们一直保持着那青梅竹马的感情，早已成为她以身相守的男朋友。不幸，在反右运动中，父亲和男朋友都被打成右派分子。我在队上所受到的待遇，完全是右派份子。实际上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以为我是右派份子。所以，晴对我是非常同情的。那时，每天早晚两餐是定量的大米饭。定量对所有的男子来说，只能算是勉强够饱。刚到农村不久的一天早餐，晴忽然捧着饭钵子，走到我的面前，出其不意地对我说：“我的胃不大好过，吃不了这么多”。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她饭钵子里的饭，一筷子划出一半，朝着我的饭钵子里倒过来。我把目光投向晴，她仍然象平日一样，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她甚至没有望我一眼。从那以后，整个下放期间，集体就餐的时候，只要有晴在场，她必定在开动之前，端起她的钵子，走到我的面前，给我分半钵饭。

有一天，我碰巧和晴一起到一个村子里出诊。回来时，已是夕阳西下，天边留下一抹昏黄彩霞，地上是一片暮色苍茫。走在田野阡陌间，展眼四顾，近处但见“一畦芳草碧芊芊，活水穿花暗护田”。（宋·朱淑真）而远处村舍错落有致，破败穷潦的丑陋细部已被暗淡的光线遮去，这片大地现出了少见的原始田园美。忽然，归程的路途由田头转入一个山坡。路旁坡阶上出现了稀稀落落的若干窑洞。我以前经过这里时常常进去稍坐，小憩片刻，偷个浮生半日。洞口不大，而内里倒可以容纳一两个人。这里前后不见人烟，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安静所在。出诊步行一个下午也确实累了，我提议到这窑洞里休息一下。我们躬着身子，钻了进去，靠洞壁坐下来，尽量使身子松弛下来。我们没有说什么。但是彼此的身子渐渐靠拢。我感到一种与尘世脱离的快乐，因为这时，我摆脱了时时刻刻包围着我的政治歧视的眼光，而身边的晴不仅从来不像所有别的人那样把我看成贱民，相反，她对我同情、支持有加。数不清的一饭之恩早已使我铭感莫名，可是，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只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轻快。我渐渐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冷漠，污蔑，厌恶，